

● 中华全景百卷书
经济资源系列

89

中国 对外贸易

朱立南

● 中国对外贸易



11228/337.9³²²⁸
337.9(1)

11228/337.9

(89)

中华全景百卷书

阅览

○经济资源系列○中国对外贸易

朱立南

首都师范大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红 王伟

王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颢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达 刘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绥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浦善新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展虹	鲁 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邵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仲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白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 中国对外贸易的悠久历史

(1)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

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距今 170 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考古中发现,在距今 2、3 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我国还处于原始社会,已经存在不同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在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产于东南海的海蚶、产于黄河以南的厚壳蚪。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山顶洞人通过以物易物得到的。我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关于部落间物物交换的传说,如颛顼时的“祝融作市”、尧舜时的“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传说中,当时主要的交换物品是牲畜、蚕丝、兽皮、渔猎工具、种籽等等。

从夏代起,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产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并且发现了对外贸易的萌芽。周朝时,分封了 70 多个诸侯国,它们同周朝王室以及相互

之间开展了通商贸易。而且,公元前 11 世纪时,一些西域国家与周朝王室有了“朝贡”往来。公元前 4—5 世纪,一些诸侯国开始同希腊进行贸易,当时希腊古书中把中国称为丝国。

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秦王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封建制度的基础。秦汉时期,中国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达,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一大壮举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经甘肃、新疆到达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叙利亚,把我国的丝绸远销到这些地方。此后,我国丝织品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路线运往地中海东部及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汉朝还在首都长安设立了“蛮夷邸”,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并开辟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与西域通商。当时的海上贸易也很活跃,广东番禺是重要的贸易都会。通过海上贸易,中国的漆器、铜镜等传到了朝鲜和日本,蜀布远销到印度。

我国的经济、文化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同周围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显著发展。当时开辟了通往中亚、西亚的商路,海上贸易远达波斯湾一带。贸易的商品也日益丰富,我国的丝织品、瓷器、纸张、茶叶、书画、香药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日

本、印度、伊朗及阿拉伯等地，并从这些地区进口香料、象牙、珍珠、玳瑁、铜器、人参、琥珀、玛瑙等。当时的长安、洛阳、泉州、扬州、广州，都是对外通商非常发达的城市。唐朝在首都长安设有鸿胪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管辖对外贸易。

宋朝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当时在广州、杭州、宁波、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和港口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船舶的进出，征收税品，收买运入的货物，把征收和收买的珍贵物品呈送给朝廷。宋朝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当时与我国通商的已有 50 多个国家。在今天的坦桑尼亚、索马里，都发现过宋代的钱币，可见宋代通商地域之广。元代继承了宋代的做法，在一些主要通商城市设立市舶司。当时泉州、上海的对外贸易都相当兴盛。明朝初期，因倭寇骚扰和实行“海禁”，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陷于停滞。此后，随着政权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才趋于活跃。公元 1405—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今天的印度支那、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印度、伊朗等 30 多个国家，最远到非洲东海岸，随船携带了大量的金银、缎匹、瓷器、宝钞等，所到之处，同当地通商互市、进行贸易，成为当时的壮举。明朝后期开始允

许私人在官府控制下进行海上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外贸领域的萌发。清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汉人在海外组织力量反清,于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使对外贸易趋于衰落。此后,虽然有雍正时期的大开洋禁,西南诸国,咸来互市”的盛况,但只是昙花一现,不久清王朝就采取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把对外贸易作为取得珍宝、香药等奢侈品供统治者享用的手段,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而且严格控制民间贸易,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更为根本的是,封建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缺乏对贸易活动的推动。不过,对外贸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通过对外贸易,西域的良马、芝麻、黄瓜、菠菜、大蒜、葡萄等农作物,装饰品和阿拉伯的“火油”等传入中国。中国的育蚕缫丝、制瓷、造纸、印刷、火药、指南等技艺,也传到了其他国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2) 中国近代的对外贸易

1840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对外贸易进入

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向列强割地赔款、开辟租界外,还给予外国侵略者在华驻军、领事裁判、协定关税、内河航行、海关管理、兴建铁路、设立银行、开办工厂、自由经商等军事、政治和经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各种特权,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下,以租界和通商口岸为据点,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向中国倾销商品。在这种掠夺式的贸易下,1868—1913年,中国外贸总额从1.2亿多关两增至9.7亿多关两,1929年又增至22.8亿关两。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下,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对外贸易,走的是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鬃、大豆、花生、锑、钨等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进口的主要是鸦片和棉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食品罐头、糖果、化妆品、丝袜等消费品奢侈品。结果,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在取得了协定关税权(1843年)和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1845年)后,大举对

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外国资本大量涌入,迅速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品检验等有关事业;官僚买办们开办的各种垄断性外贸公司,实际上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在列强和官僚买办的控制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蒙受不等价交换的掠夺。1913—1936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只上涨了39.2%,进口价格却上涨了53.3%。1925年中国出口一担珍眉绿茶可以换25.5箱壳牌汽油,到1943年只能换回1/3箱汽油了。列强和官僚买办们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吞噬了中国的大量财富。在列强的控制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877—1949年的73年中,年年逆差,总额达64亿美元,其中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外贸逆差,就达33亿美元。巨额逆差使我国金银大量流失,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为了弥补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税赋,进一步出卖主权和举借外债,使人民的负担和中国对帝国主义的屈从、依赖更加深重。

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取对外贸易的独立自主权,是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奋斗目标。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从此,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暂新的蓬勃发

展的新时期。

2. 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建立

(1) 建立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重大步骤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全国胜利后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同时确定了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根据这一决策,新中国采取了以下重大步骤,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体制。

第一,收回主权,没收官僚资本。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收回了帝国主义列强长期霸占的旧海关,对贸易实行统制,把对外贸易的独立自主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时,人民政府全面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外贸机构和官僚资本的外贸企业,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的管理部门和国营外贸企业。

第二,建立国家统一管理和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外贸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贸易部,履行内外贸管理职能。1952年以后,外贸管理职能从贸易部独立出来,成立了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对外贸易。同时,组建了专门

的国营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对外贸易和对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物资的进出口。国营外贸公司建立后立即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950年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1952年所占比重已上升到92.8%。

第三,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4600家私营进出口商,出口额约占全国的1/2。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外贸行业也进行了公私合营,少数商号则直接并入了国营外贸公司。

(2)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和基本方针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的目的是以各种手段去赚钱;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新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和实行以下的基本方针。

第一,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为了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把对外贸易置于国家的集中管理、统一领导之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第二，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在相互贸易中地位平等；贸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对等；进出口商品应互相适应对方需要；进出口商品的作价应公平合理；在相互贸易中应重合同、守信用；按国际惯例办事。平等互利的原则既反映了国际贸易交往的客观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新风貌。

第三，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就是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以国内力量为主，以国外援助为辅。就外贸而言，就是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出口创汇的可能出发，安排进口，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扩大出口。

第四，以生产为基础发展对外贸易。生产是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贸易要为生产服务。我国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强调对外贸易要关心生产、参与生产、组织生产、促进生产、为生产服务。

第五，坚持内外销统筹兼顾的方针。为了在保证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和较快增长的同时，满足人民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坚持内外销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实行以下原则，即：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限量出口；国内市场和出口都需要而货源较紧的商品，积极发展生产，挤一部

分出口；国内市场可多可少的商品，基本上供应出口。

除了上述基本方针，我国在处理对外贸易中有关问题时，还坚持和实行以下的方针、政策，即：在处理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上，坚持优先发展出口的方针，努力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以保证必需的进口；在处理进口和国内需要的关系上，坚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下，有重点地安排进口，提高外汇使用的效益；在处理外贸发展中各个地方、部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既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坚持统一对外的原则；等等。

以上贸易方针和政策，被我国长期贸易实践证明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3. 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发展

(1) 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对外贸易(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迫切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又操纵联合国，从1951年5月起纠集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企图从经

济上扼杀新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外贸部门积极开展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贸易,同西方的封锁、禁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0—1957年,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不仅弥补了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急剧下降,还带动了我国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长,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比重,也从1950年的32.4%上升为1952年的72%,此后一直保持在70%以上。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了中国很大的支持和援助。1950—1955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1笔贷款;从1952年起,开始援助中国建设“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国也向苏联、东欧国家提供了它们十分需要的矿产品、有色金属、农产品、食品、纺织品等物资,支持了它们的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我国加强了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合作。1950年,我国先后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并同一些亚非国家开展了民间贸易。1952年,中国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签订了大米、橡胶5年贸易协定,取得了反禁运斗争的一个大胜利,也开创了同未建交国家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基础上开